

鲜明坚定的精神书写

——论穆陶历史小说《屈原》兼及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

刘伟生

(湖南工业大学 中文系,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穆陶《屈原》的主题明确而坚定, 张扬屈原的爱国精神、无私品格和忠贞节操。在穆陶笔下, 屈原的形象非常鲜明, 他不仅是一位诗人, 也是一个思想家, 一个务实的爱国主义者。小说的情节简练集中, 为了突出屈原的精神, 穆陶重点写了屈原内修法度、外抗强秦与撰写祭歌等事迹。穆陶努力追求史书的品格与诗意的表达, 但相对而言, 史胜于诗, 在语言表述上尤其如此。

关键词:穆陶 屈原 郭沫若 历史小说 宋玉

中国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225(2008)02-0035-04

构思这篇小文时, 正逢国家将纪念屈原的端午节定为法定假日, 屈原之所以能获得不朽的生命力, 主要在于他博大精深的思想、崇高伟岸的人格和忧国忧民的意识。时到今日, 屈原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用已故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汤炳正先生的话说:“千百年来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和探索, 是作为人格理想的追求和完善, 是作为民族精神的发掘和发扬来对待的。”(《百年屈学》)^{[1] (P1)} 解读屈原与传承屈原精神不只是专家学者们的事情, 屈原是大众的, 也是永远的, 穆陶先生的历史小说《屈原》便是以文艺的方式传承与发扬着屈原的精神。试从主旨、形象、情节、表达四方面论之。

一、坚定的精神书写

穆陶《屈原》的主题明确而坚定: 张扬屈原的爱国精神、无私品格和忠贞节操。穆陶在自序里谈到《屈原》的创作目的时说:

人生本当有为, 无为人何以生? 故“有为”无可非, 要在“公”“私”之别耳。公而有为, 愈为愈善, 私而有为, 愈为愈恶。故兴公灭私, 扬善抑恶, 乃人生千载不移之根本也。……故屈子之伟大, 不唯因其辞赋, 更因其志略。……屈原身处江湖, 心怀故都。坚守节操, 宁愿体

解而不变, 痛悼沦辱, 誓与家国共存亡。其忠君爱国之心, 千秋彪炳, 万代流芳, 不亦宜乎? 此即《屈原》之作意也。^{[2] (P1-2)}

一则说屈原之伟大在其志略, 再则说屈原之所以万代流芳在其忠君爱国, 而归根到底, 说人生千载不移的根本是要兴公灭私, 扬善抑恶。这样的价值取向决定着穆陶对史料的选择、对情节的构架、对形象的塑造乃至作品整体风格的形成。除了宏大的叙事与整体框架的安排外, 作家心灵的寄托往往不经意中就在人物的语言中体现出来了。比如在与婵娟的对话中, 屈原谈及吴起, 说他“变法过于峻急, 从‘战’上想得多, 从‘和’上想得少。我要拟定的宪令, 是既要有利于耕战, 又要提倡人们的善性, 最后让人心回归到一个‘善’字上来, 这样才能最终消灭战争, 实现一个和平而美好的人类世界!”^{[2] (P102)} 这样的精神诉求与其说是屈原的, 还不如是穆陶自己的。当然, 笼统而言的价值观念可以体现在不同的层面: 既有个人人格的峻洁(志洁行廉, 反抗邪恶), 也有国家民族的热爱(忧国忧民, 独立不迁), 还有人生根本的追寻(兴公灭私, 扬善抑恶)。这种坚定的精神书写贯穿着小说的始终, 用穆陶自己的话说:“我写《屈原》的心理过程, 仿佛觉得是对一个遥远的灵魂的追踪。”(《戛写屈原》)^{[2] (P33)} 这种倾向的形成缘于他史家的意识与眼光, 他以读史的心态来读屈原作

品,加深了自己对屈原生平事迹和精神境界的理解。他在后记里说:“一个历史小说的作者,不能没有对历史的认识和认识历史的能力,他可以不是一个文史专家,但他必须以社会历史学家的眼光去考察研究历史,又必须以小说家的敏感去思考人生,体悟人的灵魂,将人的恒情贯穿于社会人生的长河之中。阅读《楚辞》,我希望读出历史的信息,发掘出人的灵魂的潜流。”(《戡写屈原》)^{[13] [135]}

二、鲜明的人物塑造

塑造屈原形象,首先有一个定位的问题。郭沫若 40 年代写的历史剧,大体把屈原当成了文人。在剧中人物郑詹尹的眼里,屈原“其实只会做几首谈情说爱的山歌,时而说些哗众取宠的大话罢了,并没有什么大本领。”^{[13] [141]}剧本还通过张仪和南后之口表达出了文章家应该专门做文章,不要来干预政治的观点。^{[13] [142]}在郭沫若的笔下,屈原也有媚俗的一面,比如他赞美南后的话:“啊,南后,你实在是太使我感激了。你请让我冒昧地说几句话吧,我有好些诗,其实是你给我的。南后,你有好些地方值得我们赞美,你有好些地方使我们男子有愧须眉。我是常常得到这些感觉,而且把这些感觉化成了诗的。我的诗假使还有些可取的地方,容恕我冒昧吧,南后,多是你给我的!”后来南后肆意地羞辱他时,他还在诚恳地请求:“南后,你不要降低了你的身分。”^{[13] [148]}郭沫若很清楚:“要描写屈原,如力量不够,便会把这位伟大人物漫画化,这是很危险的。”^{[13] [143]}但实际的情况是,在历史剧《屈原》中,屈原虽然没有被漫画化,但充其量只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文人形象,一个文章家的形象,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哲学家。郭沫若后来也承认“关于屈原的精神建树,可惜我在剧本里面没有表现得充分。”(《屈原与鬻雅王——致徐迟的信》)^{[13] [149]}

穆陶则明确说屈原:“分明是一杰出之政治活动家”;“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思想家”;^{[14] [150]}“他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有着独立的人格情操,有着执着的追求精神,有着爱国爱民的忧患意识。”^{[14] [156]}所以他在小说中着重写他忧国忧民的一面,扬善抑恶的一面。比如同样写屈原对郑袖(郭称“南后”,穆称“夫人”)的态度,在穆陶小说中,郑袖为了得王后之位,威逼利诱想让屈原为她写篇祈祷的颂词,可屈原义正辞严地大笑说:“郑袖你听着,我的诗词文章,写的是天地灵秀,人间真情,决不会去为罪恶作辩护,决不会去为丑恶唱颂歌!我的笔墨,永远不会去为你那肮脏的灵魂作粉饰的工具,永远不会让那可耻的私欲玷污她的芳洁!”^{[14] [153]}写天地灵秀,写人间真情,而决不为罪恶作辩护,决不为丑恶唱颂歌,这正是屈

原之所以为屈原的原因所在。这种分明的褒贬写出了屈原的本性,绝不作首鼠两端的骑墙派。无欲则刚,屈原的坚定与鲜明正是宋玉乃至后世无数以屈原为不智的中国软弱文人所无法企及的。屈原本身就是一个符号,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将其符号化、概念化。在写屈原政治斗争的同时,作品穿插着个人情感的叙述:有亲情(如与屈盖)、友情(如与昭阳)、爱情(虚化妻室,塑造婵娟),也有君臣之情(如与怀王、夫人)、师生之情(如与宋玉)。不过宗旨既明,就要贯彻到每一个细节,包括这种种人伦之情。比如爱情,在作者看来,以屈原的人品,决不会亵渎爱情;所以作品写屈原出使齐国时,齐王屡次许他在齐国选配夫人、侍妾,都被他拒绝了,婵娟与他朝夕相处,他们也真心相爱,但他们之间的爱是灵重于肉的爱,屈原在夫人去世三年后才逐渐完成与婵娟的灵与肉的结合。

关于屈原的处世之道乃至屈原其人的真实性,历史上都有过争议,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争议的前提,是因为屈原无论是人品还是作品,都是孤高特立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批评屈原不善龙蛇之道者,是因为自己难于像屈原这样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虽九死而不悔;怀疑屈原及其作品真实性者,是因为在屈原的前后左右看不到具有相当规模的作家群与难分伯仲的作品集。事情的真相或者说我们给屈原的定位正可用汤炳正先生的话来表述:“屈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变法革新的政治家、抗敌救国的外交家、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14] [157]}穆陶小说的成就首先便在于他对屈原的定位是合乎民众心理期待的。

对待宋玉也是一样,在历史剧《屈原》里,郭沫若为了衬托屈原,将宋玉塑造成了无耻的文人,可能心里又觉得惋惜,所以有意据王逸的意见将《招魂》的作者归于宋玉,并且把《橘颂》说成是屈原为宋玉所作。这样的情节构思与人物塑造总给人分裂之感。在穆陶的小说中,宋玉是一个患有“软骨病”的文人形象。对宋玉的自私与软弱,穆陶也将他放在公私善恶的微妙表演与选择中来表现,作品写宋玉面对屈原深表同情而自己曾经碰到过的庄躄,故意装作不认识,免得自己再陷入是非中去。更有甚者,宋玉背叛师门,讨好郑袖,不顾容容的安危,处心积虑地占有了婵娟。在穆陶的笔下,只有婵娟才有资格得到屈原的《橘颂》,宋玉是不可能得到的。当然,在郭沫若的历史剧中靳尚的唠叨、张仪的奉承献媚还是非常到位的。

三、简练的情节构思

穆陶的《屈原》总共不过 20 余万字,这主要得益于他简练的情节构思。屈原的主要事迹是内修

法度,外抗强秦,但史载极为简略。另一重要的依据便是屈原作品,屈原作品除了《离骚》、《九章》这样的政治抒情诗之外,受南楚巫风影响而成的《九歌》、《招魂》也是重要的依据,其实很多社会风习是由上而下的,楚国的上层政治包括屈原经历也必与巫风关系密切。因此屈原的事迹主要集中于内修法度,外抗强秦,兼撰祭歌。围绕这三条线索,小说由“忧患”而始,中经“怨恶”、“琴韵”(含修订宪令、撰写祭歌与宋玉、容容出场)、“却敌”、“使齐”,而后因党人的“私欲”而“遭厄”(杜惠、婬娟相继遭害,自己被放逐)、“问天”(殉国殉节)。

在序曲(第一章第一节)里,作品将楚人老子揉入《离骚》末尾的远逝图,以梦境的方式引出倒叙。第二节是整部小说结构的关键,在这里穆陶借魏国西门豹禁人牲祭河神故事的框架,依托“鄂君启节”这一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的文物,虚构屈原力阻小鄂君祭河神的情节。所不同的是,这一情节中导入了入水救人的庄蹻,这庄蹻曾是鄂府佣人,后因说错一句话,遭鄂家殴打并被逐出府门。另外,作品提到,屈原本是使齐回来,顺路探访民情。他从庄蹻口里知道,身为王亲国戚的小鄂君竟然违法贩卖铜铁等军用物资给敌国。在这个情节中,两大对立的阵营(屈盖、唐昧、昭阳、婬娟、庄蹻、郑袖、鄂君、靳尚、张仪)得以形成,所有的矛盾都聚焦于此,所有的故事也都由此生发开去。因为事关国家安全,楚王虽然犹豫但还是默认了屈原对小鄂君的处罚,并支持屈原的联齐与变法。而屈原的变法又因使齐与贩卖铜铁案而起,并有针对性地限制鄂君启们的特权。后来靳尚、鄂君启等人却因此而揭发屈原“勾结盗贼,图谋不轨,宣扬宪令,收买民意”。怀王在鄂君启、靳尚等人的遮蔽下,不再支持屈原的变法,他还是过问屈原,不过关心的是祭祀的事而不是屈原自己日夜操劳的宪令的事,这一情节类似于汉文帝对贾谊的“不问苍生问鬼神”。所以小鄂君及其贩卖铜铁的事是上层矛盾的焦点,而庄蹻是屈原联系民众的纽带,结识庄蹻既是屈原改革的动力之一,也是屈原遭逐的原因之一。为了集中笔墨写矛盾斗争,作者将屈原九年的流放生活一笔带过了,然后在尾声中采用“虚写”的方法,以屈原的“神游”来表现他的这一时期的悲怆彷徨而又不甘舍弃自己报国理想的矛盾心理。这样处理的好处,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是会以最俭省的笔墨来达到刻画屈原心理状态的效果。”^{[12] P357)}

显而易见,穆陶是以屈原精神来选择材料并组构情节的。相对于内修法度,外抗强秦与撰写祭歌而言,屈原的爱国精神与独立人格是一条更加深隐而又重要的线索。因为抱着严肃的创作目的,穆陶没有像郭沫若那样“想当然的揣测”^{[13] P488)}情

节,也不去追求创作时一挥而就的快感,而是始终让情节的构思为突现人物的主要精神服务。比如在郭沫若的笔下,屈原遭逐是因为误落南后圈套,扶抱南后而被怀王张仪们撞见,郑詹尹受靳尚指使毒死屈原,虽有犹豫但最终还是依计而行,结果是婬娟误食而中毒身亡。而在穆陶的小说中,屈原对郑袖一向敬而远之,送给屈原的毒酒也由送酒人杜惠主动代喝,这样的情节显然更能衬托出屈原人格的感化力量。当然,穆陶小说中也不乏过于简略的情节,如屈原入秦营退秦的情节便简单而又老套。

四、两美的诗史表达

应该肯定,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的文采、气势与激情是他人难以逾越的,尤其是其中的《雷电颂》,以无以复加的火山喷发般的激情写活了屈原的极端愤怒。郭沫若说自己创作《屈原》时,“脑识就像水池开了闸一样,只是不断地涌出,涌到了平静为止。”^{[13] P485)}郭沫若的《屈原》给人印象最深的正是这种满富才情的诗意表达。在郭沫若笔下,就连南后也是文采飞扬的,她说屈原:“就说你的诗,也不比一般诗人的那样简单,你是有深度,有广度。你是洞庭湖,你是长江,你是东海,你不是一条小小的山溪水,你不是一个人造的池水啦。”^{[13] P489)}她说自己:“我是不能够甘于寂寞的。我要多开花,我要多发些枝叶,我要多多占领阳光,小草、小花就让它在我脚下阴死,我也并不怜悯。”^{[13] P489)}连自私之心,嫉妒之心也以比喻敷陈出之。

相对而言,穆陶的《屈原》更具有史学的品格。上文关于情节的构思与形象的塑造已有所提及,在表述风格上,穆陶小说也表现史书般的严谨与冷静。他自己说:“至于某些属于职位的专称,我是认真对待,不敢含糊从事的。”^{[12] P358)}这与他的主观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很重视史料的分辨工作与屈原接受的情况,以及屈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小说末尾所附的《屈原评说文摘》、《历代咏屈原诗选抄》及《参考文献》便是明证。作品的表现形式往往不是一个单纯的形式问题,而是同时选择了一种价值观念和形式立场。

当然穆陶很清楚,著意于史书的品格不应该放弃艺术的立场,更何况自己所面对的是伟大的诗人与浪漫瑰奇的作品。所以序曲中有在《离骚》远逝图的基础上揉入老子而成的梦境的描写,末尾又将《离骚》中陈词舜帝、上下求索、远逝自疏的神话境界搬入了小说。中间更有舜帝《南风歌》的引入,《国风》“二南”诗歌的引入与对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的借鉴。还有为怀王作《招魂》的场面,以《山鬼》祭容容、婬娟、杜惠乃至一切圣洁而遭遇不

幸的女性的情节，和在溱浦碰到歌而过孔子的楚狂接舆的第五代玄孙的遭遇。所以曾敏之先生在为这部小说作的序里说：“作品以凄婉的情节，将当时楚国的社会风貌和《离骚》的神话内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更使小说带上了诡异虚幻的浪漫色彩。”^{[12] (P4)}应该说，曾氏的这一评价是比较公允的，穆陶在努力的追求着诗史两美的叙述风格。

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两美的境界主要体现在宏观的情节与场景，在具体的语言表达上却未能如愿。穆陶欣赏郭沫若历史剧语言的通畅，在自己的小说中也有意使用今天的口头语言，但他不像郭沫若那样做得彻底，他不甘心放弃自己作品的学术含量与文化氛围，所以他经常在文白之间、雅俗之间摇摆不定。雅的如：

还为先生准备好了文车一驷，焦桐古琴一张。^{[12] (P246)}

郑袖欠了欠身子，用柔荑般的手指抚摸着楚王的手臂。^{[12] (P10)}

“柔荑”本出《诗经·硕人》，是极典雅之语，用在这里却于整体风格不宜。俗的如：

屈原：“……因为走时遇上点麻烦，没有来得及购买，真是对不起你。”^{[12] (P23)}

(接舆五代玄孙)：“怎么？你是查户口的？”^{[12] (P328)}

(接舆五代玄孙)：“信不信，不信我信。”^{[12] (P329)}

昭阳听了，恨恨地道：“靳尚算个什么东西！肯定他又受了张仪的礼，这种人吃里扒外，狗也不如，向大王禀报时一定告他一状！”^{[12] (P42)}

只见小鄂君声嘶力竭地喊起来：“要杀我又来看我，他妈的我成了猴儿了！大王大王，大王是我的姐夫，屈原是我的儿子，你们统统是我儿子……”^{[12] (P105)}

屈原与溱浦老人——接舆五代玄孙的话太俗，纯粹是市井语言，不合两人的文化身份。昭阳的话，虽解心头之恨，但毕竟有损正人君子的形象。小鄂君被斩去双足，内心必至暴戾，但再卑劣的本性也不一定要用粗俗的语言来表达。还有不少文白夹杂，雅俗难调的：

屈原说：“当今天下强国，惟楚、秦、齐而已。不进则退，此乃常理。这次五国伐秦失败，已经证明了秦国国势的强大。臣以为，当务之急，不在外而在内。”^{[12] (P19)}

屈原：“臣不能预察张仪之奸，是臣之过。但求大王将张仪的所作所为通告秦王，同时宣布张仪为不受欢迎的人，将他遣送回国。”^{[12] (P55)}

张仪道：“无论如何，贵国杀我一人辱我一人，这是在下不能接受的，我要提出抗议！”^{[12] (P63)}

此中“不受欢迎”、“抗议”之类实在太过现代了。

还有与语言相关的注释问题。为了保持传统文化的面貌，穆陶在小说中用了一些古语，不得不加上一些注解，这本是一大创意，但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也难免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鄂君启是当今国王的外舅。”用“外舅”又于页下加注：“先秦时称岳父曰外舅。《尔雅·释亲》：‘妻之父为外舅。’”^{[12] (P12)}绕了这么个圈子，不如直用“岳父”就是。他如“宫宰”、“灵子”等莫不如此。又有需注而不加注，不需注而加注者，前者如老子之“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后者如“后宫”之类。就语言本身而言，穆陶的小说不若《三国演义》式的浅近文言典雅，也不若郭沫若式的现代白话畅快。诗史两美的评价也要因此而大打折扣。

余论

历史小说总难于历史与小说的双重要求、双重品格下游刃有余。过于强调历史的真实与道德的评判会使小说变得刻板干枯，而无端的附会与情欲的恣纵又会让作品坠入庸俗卑媚。不仅如此，历史人物本身的性格与成就及其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千差万别的。一般的人物可以解构，但真正的民族精英不容嘲弄，真正的民族败类不可翻案。屈原是千古精英中的第一人，自然不容丑化、滑稽化乃至文人化。在这样的民族精英面前，一个作家不能丧失起码的道德良知和人文关怀。穆陶历史小说《屈原》的成功在于其始终诠释着民族文化的灵魂，思索着生命的存在价值与意义，指引着现代人们努力的方向与目标。

(责任编辑 陈俐)

参考文献：

- [1]褚斌杰. 屈原研究(《二十世纪学术文存》)[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2]穆陶. 屈原[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
- [3]郭沫若. 郭沫若剧作全集[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2.
- [4]汤炳正. 楚辞讲座[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